

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 政 袁一瀛

摘要: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不断做强做优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式”竞争困境。“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系统性资源错配的低水平、同质化的非良性竞争和行业内耗,是一种零和乃至负和博弈。“内卷式”竞争是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需求压力、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特殊阶段固有矛盾、政府不当干预与企业低价促销和重复投资行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有企业因其制度属性、使命功能及资源整合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此,国有企业应致力于实现包容性、差异化、内涵式与可持续发展,加快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推进“三个”集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构建协调发展机制、产业链协同机制和良好的产业生态带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跃升,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

关键词:国有企业;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两个毫不动摇”;包容性发展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10

一、问题的提出与基本概念界定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作为实体经济根基的制造业健康发展造成显著冲击,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①。中央就反“内卷式”竞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②,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③,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整治“内卷式”竞争^④,此后,“十五五”规划纲要则进一步作出了系统部署^⑤。可见,整治“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尽管“内卷式”竞争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但由于制造业具有资产重、生产周期长、外部性强等显著特点,且对培育新质生产力及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致使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破坏性更强、范围更大,影响更深远,加快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良性竞争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催生新产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有企业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研究”(22JJD790025)。

作者简介:李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136; zhengli@lnu.edu.cn);袁一瀛(通讯作者),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 110136; yuanyiyi2001@163.com)。

- ①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版。
-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31日,第1版。
-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第1版。
- ④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5页。
-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14页。

品、新产业、新业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一流企业不断涌现、制造业由弱到强都得益于市场主体公平、合理、适度的竞争。而“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系统性资源错配的同质化、非良性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和行业内耗,是指经营主体不断投入生产要素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福利增加和竞争力增强的现象^①,是一种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模仿导致的同质化竞争^②;二是通过低价倾销、价格战等方式破坏市场秩序的“逐底竞争”;三是因企业过度涌入而形成的市场主体过密、竞争失序等非理性竞争^③。这些行为导致相关企业不断以自我消耗为代价去伤害竞争对手,进而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行业整体利益损失和社会净福利降低。相比其他行业,制造业的体量更大,产业链效应更强,因此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不仅表现为横向内卷,即低端产能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严重、低价恶性竞争频发、核心技术创新乏力等,还表现为纵向内卷,即企业利润压力通过产业链传导放大为系统性风险等^④,企业“越卷越亏”、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创新动力衰减、制造业行业生态受到破坏,最终将导致宏观经济增长失速与系统性脆弱性的双重深化^⑤。

针对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现有文献已从多个维度展开研究,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成因分析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学者们对“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做了大量探讨,但专门针对制造业产业进行的成因分析还不够深入和系统。第二,治理对策偏重外部制度调整。相关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策略,主要包括推动企业技术创新^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⑦、优化制度环境^⑧、促进消费升级^⑨等。但这些策略大多是从政府行为、市场秩序、体制机制与政策等外部环境角度出发,忽视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责任与作用。第三,即便个别研究从微观企业主体角度进行了分析,也并没有深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治理“内卷式”竞争中的不同作用。国有企业因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制度属性与使命功能,以及在制造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无疑要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但现有文献对此鲜有专门探讨,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痛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试图厘清制造业“内卷式”竞争背后的多维成因,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国有企业如何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强化了对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研究;二是对国有企业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的独特优势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三是立足于“两个毫不动摇”,提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有效对策。这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① 李扬、王树华:《引导竞争朝着更加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有效防止“内卷式”竞争》,《人民日报》2025年7月31日,第9版。

② 白伟、耿晓晨、俞荣建:《产业链内卷式竞争机制及其感知风险效应——基于BERT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③ 黄娅娜、邓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制与治理建议》,《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6期。

④ 黄群慧、叶其楚:《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改革》2025年第6期。

⑤ 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经济学家》2025年第5期。

⑥ 邓洲:《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的表现、成因和治理思路》,《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5期。

⑦ 巨力:《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求是》2025年第13期。

⑧ 郭威、李泽浩:《“内卷式”竞争:内涵、成因与治理》,《理论探索》2025年第4期。

⑨ 刘志彪:《“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理与综合整治》,《人民论坛》2025年第16期。

二、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成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有效防范和整治制造业“内卷式”竞争,首先要深刻认识其产生的根源和形成机理,进而寻找有效破解之策。有必要指出的是,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挑战。因此,不宜以“内卷式”竞争作为企业或产业效益不佳的理由,更不应动辄将所有问题和困难都归因于“内卷式”竞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既有宏观环境因素也有微观主体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供给因素也有需求因素,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固有矛盾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性因素。

(一)内外需双重压力下的制造业生存空间挤压

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发展与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国家为转嫁自身矛盾,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大打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搞所谓制造业“回归”,进而妨碍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使中国制造业在部分国家出口受阻。如2025年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位于荣枯线以下,4月一度跌至44.7%^①。同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国际需求普遍有所收缩。从内部环境看,经过4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加之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制造业“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此外,房地产等传统支柱产业深度转型,抑制了上下游制造业的市场需求。由于制造业生产刚性特征明显,产能难以快速调整,加之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局部需求下滑沿产业链传导后被放大,进一步加剧了整体波动。

当前内外需困境的具体表现与影响在不同区域和行业间呈现出显著差异。从区域维度看,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外向型制造业集群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对出口订单高度敏感。当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大量中小型外贸代工企业被迫出口转内销,涌入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因而“内卷”表现为激烈的价格战。中西部地区直接受出口冲击较小,更多受制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需求放缓,其“内卷”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同质化重复建设,导致区域间低水平竞争而非互补性发展。从行业维度看,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承受东南亚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订单分流与国内消费持续升级的双重压力,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部分企业选择降价求生,从而加剧“内卷”;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高端领域遭遇一些国家的封锁与打压,在中低端领域又陷入同质化竞争;而部分新兴产业经历早期爆发式增长后,大量追随者涌入、重复建设加剧、资本过度集中,市场由蓝海步入红海,呈现出同一赛道过度拥堵的“内卷”现象。不同地区、行业的生存压力虽然不尽相同,但都面临类似的内外部供需结构性失衡,虽然有些是周期性、暂时性的,但都不同程度诱发、加剧了制造业“内卷式”竞争。

(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与转型期阶段性固有矛盾交织

内外部需求冲击是诱发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导火索,但在需求收缩形势下,市场机制未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推动产业升级,竞争压力难以转化为创新和提质增效动力才是“内卷式”竞争产生并蔓延的深层根源。首先,尽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差异,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难免受其一般规律影响。以追求自身利益和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竞争一方面可以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效率变革、推动技术进步的引擎,另一方面也存在异化倾向。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为追求利润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装备,致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变资本C相对于可变资本V的比例上升),长期将引发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为对抗这一趋势,企业可能会扩大产能与市场占有率,也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与研发成本,陷入争夺“存量蛋糕”的零和甚至负和博弈。此外,信息不对称、调节滞后等市场经济固有问题也会导致资本过度集中、重复建设等现象。因此,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本身就

^① 《2025年4月份制造业PMI为49%》, <http://www.chinawuliu.com.cn/lhhzq/202504/30/649460.shtml>, 访问日期:2026年6月25日。

蕴含着从良性竞争发展到“内卷式”竞争的风险。

其次,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面临一些阶段性挑战。随着要素成本优势逐渐消退,国际环境日渐严峻,一些旧的体制机制未能及时根据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使得“内卷式”竞争在局部固化、深化。一方面表现为不当干预过多。如部分地方政府政绩观错位,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以选择性补贴、政策倾斜等方式招商引资或扶持本地特定企业,产业发展和布局未能基于本地资源要素禀赋进行差异化定位。还有部分地方政府为保障本地税收与就业,设置隐性壁垒,致使低效企业在行政保护下无法被市场自然淘汰。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制度供给和执行不足。例如,创新激励机制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位等。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在提供引导创新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存在短板,对一些平台型企业和新业态监管不到位,未能及时纠正不正当竞争^①。

(三)微观主体自身战略选择与发展质量及相互影响

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固然与国内外环境变化、市场机制缺陷、政府职能错位等结构性因素紧密相关,但企业自身战略决策失当及创新能力不足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内因。首先,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不高、同质化竞争策略突出是“内卷式”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当前,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处于技术跟随与模仿创新阶段,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都比较匮乏。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倾向于在现有技术轨道上渐进式改进,而不愿意投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决定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核心零部件仍依赖国外引进。此外,许多制造业企业未能构建清晰的品牌战略或独特的价值链定位,产品和服务缺乏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少企业长期充当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代工者,缺乏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能力与意愿,企业难以获得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进而无力承担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更难以向智能制造、先进制造和服务型制造转型,只能依靠规模经济、低水平投资与“质次价廉”、薄利多销来维持基本生存。

其次,平台型企业在加剧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亦负有一定责任。平台型企业依托网络效应与数据资源等优势,一方面催生了新的资源配置与交换方式,促进了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商业逻辑和运行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挤压了其生存发展空间。平台型企业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与智能分析,改变了传统制造业部分产品定价与交易模式^②,使得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不仅没有定价权,还要对其进行被动让利。这些企业为获取更多订单与流量,卷入由平台主导的频繁促销与价格战之中,竞争焦点转向对平台流量分配规则与算法推荐机制的迎合,无力进行创新和品牌建设,不得不为生存而“弃品质、求低价”。因为“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高质量的产品也未必能够赢得市场占有率^③。制造业头部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资源能力与议价能力能够抵御价格战对利润的冲击,维持领先地位,但缺乏定价权、融资优势与分销渠道的中小制造企业,只能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进行激烈的同质化产品厮杀与价格战,最终丧失自身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权和机会。

三、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理论逻辑与机制

如上所述,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主要是结构性供需错配、生产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不完善所致,其核心是企业创新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体系不完善,特别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形成。在

① 张金杰:《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求是》2025年第24期。

② 黄群慧、叶其楚:《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改革》2025年第6期。

③ 付伟、蒋安丽:《数字化内卷: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链的重构与挑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在客观上负有一定责任,同时也都深受其害,因此都有反“内卷式”竞争的需要和动力,也都应该主动作为、积极反“内卷”。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因其独特的制度属性、资源禀赋与使命功能,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更应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对于反“内卷式”竞争,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使命要求其“必须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新国企要求其“主动做”,国有企业拥有的优势地位和资源支撑其“能够做”。

(一)国有企业在“内卷式”竞争形成中的正反两方面作用

1. 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形成中的抑制作用。总体上,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正面的抑制作用,也有负面的推动作用。但正面作用是主流,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勇担职责使命、有效发挥核心功能,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才有效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具体而言,首先,国有企业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与产业链的作用,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了安全生产、持续发展的空间。中央企业等国有大型企业作为“链主”企业能有效协调上下游企业,推进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主动提升行业集中度,如稀土、钢铁等行业通过国企重组提升集中度,打破了相关资源贱卖与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其次,国有企业通过关键核心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攻关,为相关产业和企业拓展市场空间、降低生产成本、创造发展机遇。同时,国有企业通过承担高投入、长周期的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最后,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反“内卷”示范作用。如在光伏、储能等领域修改招标规则,提高技术分权重、剔除恶意低价,引导下游企业从“卷价格”转向“卷技术、卷质量”;以政策与资金优势稳定供应链,强化合规与节能环保等社会责任,抑制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与生态稳定。

2. 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形成中的推动作用。部分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形成过程中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一是部分国有企业受错误政绩观的驱动,利用融资优势、监管漏洞,不惜薄利、无利也要进行低水平投资、产能低效扩张,从而引发低价竞争、压缩全行业利润;在财政与信贷背书下宁可持续亏损也要接单,引发行业“降价—降利—降质”恶性循环。二是部分国有企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如部分国有企业对创新重视不够,缺乏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只能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同质化竞争。在有关政府部门的推动下,部分地区的国有企业一哄而上进入新兴产业,以至于在新能源等领域重复投资,加剧行业“内卷”。三是部分国有企业破坏制造业产业生态,如个别国有企业存在超长账期、拖欠账款、压价分包等行为,致使不少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削弱了产业链韧性。

(二)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必要性必然性

1. 国有企业新时代使命功能决定其要在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①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肩负着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制造强国的重大使命,必须坚决抵制并着力破解“内卷式”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的瓶颈约束。首先,从战略定位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导力量,其行为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关乎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因此应以自身转型升级带动制造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避免与民营企业陷入低价竞争、重复建设等零和博弈。其次,从市场纠偏角度看,制造业“内卷”多源于市场失灵导致的恶性价格战和创新投入不足等,国企作为有为政

^① 《习近平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充分认识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4日,第1版。

府与有效市场的桥梁纽带,有责任带头纠偏,维护产业价值与生态。最后从行业治理角度看,国资委明确要求国企围绕“三个集中”优化布局、抵制“内卷”,通过行业自律与重组整合,引导产业从“零和(或负和)博弈”转向“竞合共赢”。

2.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制造业国有企业带头反“内卷”。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首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国有企业通过退出非优势赛道、开放技术与平台,为民营制造企业释放空间、提供支撑,形成“国企引领升级、民企激活活力”的良性互动生态。其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而“内卷式”竞争又往往由地方保护主义、要素流动不畅、规则衔接不足等引起,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发挥政策导向与市场运作的双重属性,带头推进跨区域整合与专业化分工,破除地方分割,支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高效领域流动。最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而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主要源于不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反“内卷”就是带头反对不公平竞争、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做规则的塑造者和维护者,不能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进行低价倾销、非理性补贴等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要带头以质量、创新、标准取胜,坚持质价双优,为制造业全行业树立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的标杆。

3. 制造业国有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要求其主动反“内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必须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①。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国企必须主动跳出“内卷”陷阱,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造创新领先的现代新国企。“内卷式”竞争不利于国有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延揽高端人才,势必损害其长期竞争力。只有坚定反“内卷”,转向差异化、品牌化路线,国有企业才能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拼成本、拼规模转向拼技术、拼品牌、拼质量,提升“五个价值”,实现企业效益与行业、社会价值协同增长。

(三)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优势与可行性

1. 改革倒逼与政策引导。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破解“内卷式”竞争、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政策引导,国有企业反“内卷式”竞争的体制机制与氛围逐渐形成。一是通过国企内部改革破除其“内卷”根源。通过建立多元化考核体系,弱化短期规模、营收指标权重,强化创新、价值创造、协同导向,推行“一企一策”穿透式考核,健全容错免责与中长期激励机制,将薪酬与创新贡献、长期绩效挂钩;同时硬化预算约束,剥离隐性补贴,破除地方保护,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动低效产能与“僵尸企业”有序出清,释放资源向创新领域集中,推动企业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协同创新。二是通过政策引导构建健康产业生态。国务院国资委明确将抵制行业“内卷”纳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推动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同时健全制造业产能调控与行业自律机制,严控新增产能、推动减产与兼并重组,修复行业盈利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协同引导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倾斜,支持国有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牵头关键技术攻关,避免在传统领域同质化竞争。

2. 体制机制与能力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利用其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体制机制优势,坚守长期主义,重构行业价值标准。如带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环保投入,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凭借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能够在投入大、周期长、其他企业缺乏意愿或能力的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首先,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可以持续加大基础

^①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4日,第1—2版。

研发经费投入、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承担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的基础研究与前沿创新、重大科技攻关,实现技术范式转型,打破“低端锁定”,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展空间。其次,依托在能源、钢铁、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升级采购标准,引导上下游企业注重质量与创新,重塑竞争导向。最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推进专业化整合,优化存量产能、防止产能过剩,为中小企业腾挪空间,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此外,国有企业可凭借抗周期与抗风险能力,同民企一道“抱团出海”,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议价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3. 资源禀赋与基础保障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能够持续投入5G基站、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制造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产品支撑,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为中小民营企业聚焦细分赛道、灵活开展配套创新创造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社会信誉较好,能够承受退出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转型成本,自主消化职工安置、债务化解等隐性成本,避免因企业倒闭引发的就业冲击、债务风险等社会问题。此外,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的直接执行单元,具有政策传导与行业示范效应,拥有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构建信用与评价体系的话语权和带动力,引导企业的竞争焦点从寻租、地方保护和价格厮杀转向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动能和坚实保障。

(四)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内卷式”竞争的机制

1. 产能优化与协同布局机制。制造业“内卷”的核心症结之一是各类市场主体分散布局、盲目非理性扩张。国有企业可以深度承接国家战略规划与产业政策,实现资源向优势领域集聚和主责主业集中,从而推动产能布局从无序竞争转向协同优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可通过兼并重组、横向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压缩同质化供给。如组建产业联盟,统一技术标准与产能调配,避免同类产品的低价恶性竞争,提升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基于自身的战略定位,主动退出低效产能领域,聚焦高端制造、关键零部件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引导行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同质化赛道向高附加值的差异化赛道转移。这种以战略引领为核心的产能优化,打破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内卷”格局,推动行业发展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2. 技术突破与高端引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①,中央企业“要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强化基础支撑,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关键共性技术供给质量”^②,这些论断为国有企业通过创新引领破解制造业“内卷”提供了根本遵循。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国有企业通过统筹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承担“卡脖子”技术攻关的重任,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等领域,国有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产业链空白,摆脱低端同质化竞争。二是国有企业能够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与行业共享,通过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向行业内中小企业输出自研先进技术、工艺标准等,带动上下游企业同步实现技术升级,提升行业整体技术准入门槛,引导制造业发展从“价格内卷”转向“技术竞赛”。

3. 产业链协同与政策协调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③。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可通过纵向整合与横向协作,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在纵向维度,国有企业可与上游原材料企业、下游应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共建生产基地等方式,稳定供应链价格,避免因原材料价格波动引发的恶性成本竞争;在横

①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充分认识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4日,第1版。

③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397页。

向维度,国有企业可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共享研发设施、技术专利与市场渠道。此外,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可依托自身的政策敏感度与资源整合能力,精准衔接产业政策与市场需求,率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大投入,弥补市场失灵,推动行业竞争回归理性。

四、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实践路径

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首先要充分认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增强使命感,做好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展开具体实践。当前,国企改革已进入功能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要求国有企业在优化布局结构、聚焦主责主业的基础上,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功能,在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做好表率,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不断激发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内生转型动力和创新创业活力。基于此,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

(一)坚持包容性发展,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

国有企业破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源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是指使经济发展回归增长本意,不盲目追求量化指标的提高,而是力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民生改善同步实现的协调共享发展^①。包容性发展实质上意味着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让其他经济主体也都获得发展的机会,并从发展中获益。尽管起初包容性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念是针对国家与区域发展提出的,但也完全适用于微观市场主体间的竞合关系。如果说“内卷式”竞争代表的是企业间的零和或负和博弈,那么包容性发展所代表的则是企业间的正和博弈,其倡导的“兼容、共赢、公正、共享”发展原则,正是缓解恶性竞争、推动利益共享、破解当前制造业“内卷”困境的理念指引,因此国有企业在反“内卷”中应该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即国有企业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主动带动其他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中央企业和有条件的地方国有企业应切实发挥产业链“链长”的组织引领作用,通过合理分工协作带动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实现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从根本上破解同质化恶性竞争。具体来说,在资本合作方面,国有企业应积极牵头或参股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科创基金和并购基金等,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出资,优先重点扶持符合国家战略、本地产业布局的民营科技企业及有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在与民营企业合作或引入民营资本时,国有企业应超越财务融资导向,构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匹配的、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民营投资者在董事会、监事会中拥有具有影响力的席位,并赋予其在重大战略决策、关键人事任免、投资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实质性投票权与建议权,并建立公平、透明的合作规则与风险分担机制;在业务分工方面,国企应聚焦重资产、长周期硬核项目,将细分领域订单分包给中小民营企业,使其发挥灵活配套优势;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强化示范引领,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应用场景及提供试用环境,牵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应用落地,形成各类主体协同、开放共享的产业创新生态。

(二)坚持差异化发展,致力于提升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就是要带头避免低水平投资、重复建设与同质化竞争,因此最重要的是坚持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最核心的是全面提高创新能力,以创新为差异化奠定基础。国有企业要聚焦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以“十五五”规划以及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引领,紧扣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始终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① 倪明胜:《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及其政策指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9期。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国有企业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关键,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制度创新是基础,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实现双轮驱动、相辅相成,这不仅是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自身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国有企业开辟增长“第二曲线”的必经之路,更是为民营制造企业提供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支撑,拓展了民营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当前,国有企业应大幅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积极开展颠覆性创新等原始创新;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等制度与资源优势,打造创新联合体,培育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勇于投向风险高、周期长的“无人区”;并通过构建开放共享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平台向全行业扩散技术成果,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链升级迭代,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国有企业要将优势资源深度投入技术壁垒最高的研发、标准制定、核心部件生产及系统集成能力上,加快实现从要素大量投入的“汗水型增长”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增长”转变。此外,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应该着眼于创新所形成的技术、标准与市场机会是否具备一定的可及性,即能够为民营制造企业创造发展空间,而非追求技术垄断与市场排他性的传统创新模式。因此,国有企业应主动致力于攻克行业共性工艺与材料难题,积极提供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

(三)坚持内涵式发展,致力于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坚持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宗旨,致力于价值创造和使命担当,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国有企业助力破解“内卷式”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路径。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发展要以自身的使命功能,特别是核心功能为出发点,发挥兜底保障、基础支撑和引领示范作用。为此国有企业要合理界定自身发展的范围与边界,加快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给其他所有制企业让出发展空间。同时国有企业要聚焦并动态调整主责主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所当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意味着国有企业要提高效率、效益和创新能力,要占领产业链中高端,要和国际同类产品竞争,要占领国外市场,而不是和民营企业“卷”价格、争利益。国有企业的任务首先是实现功能价值,其次才是经济价值,但没有经济价值的实现,也难以实现功能价值。二者都体现了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首先应遵循分层分类原则,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评价机制;其次要清晰界定并动态调整自身主责主业,坚决摒弃与核心功能关联度低、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业务,实现主攻方向的差异化聚焦、资源的战略性集中;最后,进一步改革以营收、利润为主的短期考核导向,建立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绩效考核体系。大幅提升对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质量品牌、效率效益等核心功能与能力指标的考核权重,并配套中长期激励措施。监管部门要引导国企管理层控制盲目扩张的冲动,使其企业战略决策始终聚焦于国企核心功能的强化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此外,国有企业要通过提升自身品牌价值,向市场证明通过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所能获得的利润空间,通过“五个价值”的提升,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价值创造的佼佼者,向供应链上的合作企业输出科学的管理经验、质量管控体系等,引领整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致力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良好的市场秩序有利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配置,并引导企业积极投入资源进行创新,给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同时加快提升制造业硬实力、提高利润率。反之,无序竞争、盲目扩张则会加剧“内卷式”竞争。国有企业要从自身做起,消除市场不公平竞争、无序竞争与过度竞

争的根源,解决供需不平衡、低效落后产能等问题,同时引导资源流向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最需要的领域。为此,国有企业一是要避免依托市场支配地位和资源获取优势而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不公平挤压,如拖欠账款、过度压低采购价格等;二是要基于市场原则和长远发展需要进行投资决策,避免因政府施压或引导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某些民营企业已经做得很好的项目一哄而上、盲目投资扩张;三是要主动淘汰落后产能,主动退出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

此外,国有企业应建立并执行比行业通用标准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尤其在招投标、商业谈判与定价上,通过设立价格行为审查等内部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为抢占份额而发起的恶意低价竞争,严抓合规经营与稳健经营。国有企业还应主动将竞争焦点从价格转向价值,在市场竞争中,带头抵制低价倾销,鼓励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技术创新、服务优化和品牌信誉等来赢得市场份额,为整个行业释放出合理的利润空间,让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能有机会和资源投入研发与升级,形成优质优价优利的良性循环。同时,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规则。国有企业要主动牵头制定并率先采用先进的行业技术标准、质量认证体系和绿色低碳规范,带头推进企业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协同发展,并将其纳入企业整体发展规划,即通过将自身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制定更高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服务标准,规范行业竞争秩序,遏制低价恶性竞争。

五、结语

当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内卷式”竞争不仅是行业困境,更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跨越的阶段性挑战。我们既不能忽略“内卷式”竞争对制造业本身乃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严重危害,也不能简单地泛化“内卷式”竞争及其影响。制造业“内卷式”竞争本质是相关企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和创新不足,背后的根源是政府没能合理发挥作用与市场存在失效、失灵。同时,受国内外需求环境变化、产业升级不足导致平均利润率递减、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等多维因素影响,制造业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增产不增收,并出现低水平扩张、重复性建设、过度低价竞争的产业发展态势。国有企业性质决定其具有助力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使命功能与责任,同时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与高质量发展需要,使其在反“内卷”中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具有现实可行性。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集有为政府的贯彻执行者与有效市场的维护者于一身,应带头践行共享共赢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积极与民营企业开展优势互补的多种合作,推动构建新型产业创新生态。从自身高质量发展角度看,国有企业需把握好战略定位,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突破现有技术与产业竞争范式,全面增强创新能力,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同时应聚焦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坚持内涵式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行业标准统一与落后产能退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不仅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课题,还是发展课题,更是对旧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扬弃。当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战略、行为模式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及国家与人民利益相匹配,在价值创造与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同频共振、各展所长时,中国制造业必将进一步提质增效,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竞争中赢得主动,最终实现并巩固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和目标。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Help Resolve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Manufacturing

Li Zheng Yuan Yi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P. R. China)

Abstrac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lifeline of a nation’s economy and the bedrock of its strength. In recent years, while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grown stronger, it has also faced serious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a low-quality, homogeneous, and self-defeating rivalry driven b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where enterprises keep investing more without gaining revenue or competitiveness. It is a short-sighted zero-sum or even negative-sum game characterized by unfair, disorderly, and irrational competitive behavior. This problem stems from multiple factors: slowing global growth and weak domestic demand squeezing businesses; persistent obstacles to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uch as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fragmentation, hindering factor mobility and orderly exit of outdated 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R&D spending, leaving firms with little innovation or differentiation, thus worsening homogenized competition.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addressing the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one h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ar the significant mission of strengthening, optimizing, and expand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mproving the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mselves. This requires them to begin with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 break free from the path dependence of low-level repetitive expansion, take the lead in upholding a fair and competitive market order, and remove the bottleneck constraints imposed by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On the other h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so possess unique advantages in helping address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First, the important directives issu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regarding comprehensive efforts to tackle “involutional” competition provide a reform basis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counter such competition. Second, by leveraging their strength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ir dominant industrial posit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adop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undertake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asks. Third, with substantial capital reserves and strong risk resilience, they can deliver low-cost, high-efficiency public goods that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their concrete practices that serve the broader goals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people’s livelihoods. They should adhere to inclusive, differentiated, connotat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driving the common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ir ow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ading overall improvements in manufactur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providing solid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wo unwavering principles”; Inclusiv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王玲强]